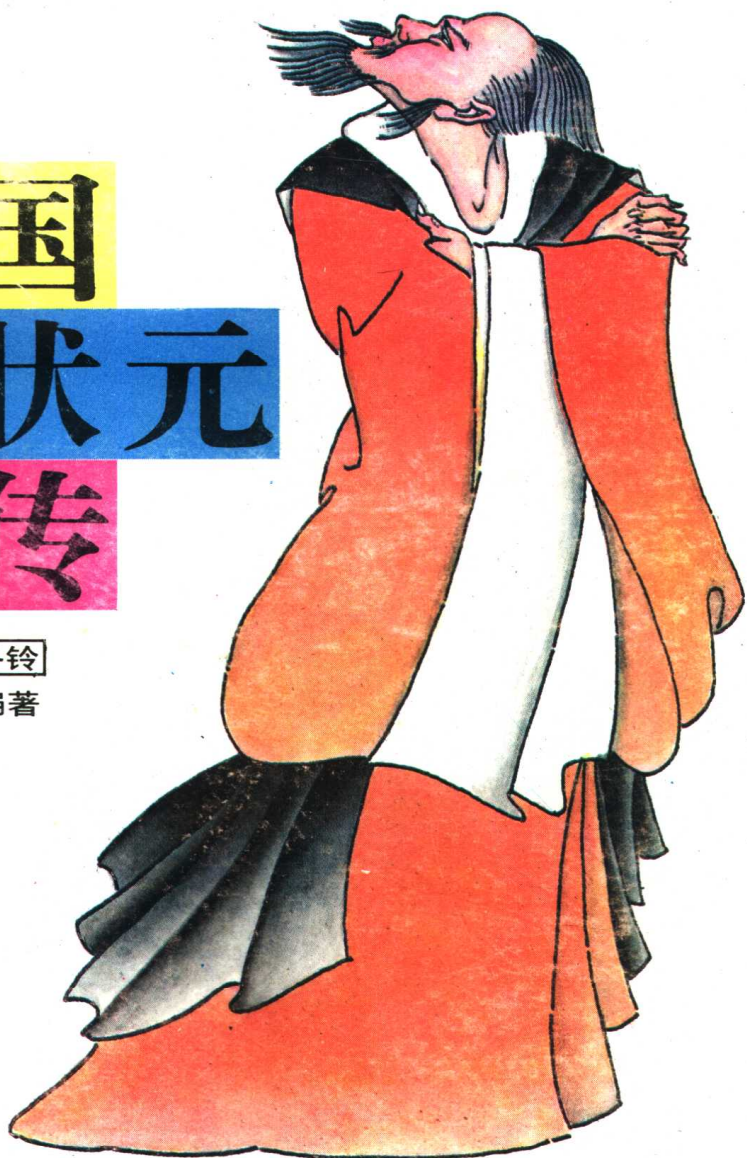


中国十人外传系列

中国 十状元 外传

柴剑虹 盛冬铃
徐俊 等编著



中国十人外传系列

闻史甫主编

中国十状元外传

柴剑虹 陈洪彝 谢思炜 盛冬铃 赵仁珪
钱慧蓉 樊善国 赵伯陶 徐 俊 李继昌
张奇慧 唐 芜 编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中国十人外传系列

中国十状元外传

柴剑虹 盛冬铃

徐俊 等编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公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20万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860

ISBN 7-216-00852-9

K·106 定价：3.40元

状 元 小 识

中国人崇尚利用演戏和传古来进行教育，故而中国老百姓对状元的了解，也往往是从民间传说和传统戏曲中来的，这自然难免使状元富有种种的传奇色彩。这里给你的是依据史实剪裁的十个真实的状元故事。

所谓状元，抄《辞海》的解说是：“科举考制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均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因其为殿试一甲第一名，亦别称殿元。”

查《辞源》的解释略略不同了：“科举时代称廷试第一名为状元。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考试都须投状，因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人为状元，也称状头。宋开宝六年以前常称榜首，开宝八年定礼部复试之制，始以廷试首名称状元。然有时一甲三名都称状元。自元以后则仅限于称呼殿试第一名。”

这两段文字的主要意思不外有二：其一，状元是唐时开科举以后就有的称谓；其二，宋代正式行殿试制，第一名正式称状元。

本书就是以宋代的第一名状元为开篇的。

欲说状元，不能不先说到科举制。状元是科举制这个六面体最上的一个面，也有人说状元是中国科举的产儿。中国

的科举制自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唐人贡士之法，多循隋制”（《通志·选举略》），经隋唐宋元明清诸朝的创沿增益，形成封建社会里最完备的颇具规模的一套制度，其行约1300余年，影响历史也深，对其评价也异。且举几例对立的看法：

《人民日报》（1991.3.20）刊载的新华社消息《大型中国考试史开始编纂》有云：“我国是世界上考试制度形成最早，发展最完备的国家。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亚洲许多国家的文化也产生过重大影响。”

英港合拍的一部电视剧《天才曾经是中国》（The Genius That Was China）则谈到远在欧洲还十分封建落后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民主的萌芽，这民主的萌芽指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说中国几千年前（此处有误，似应为一千多年前——引者）就知道考状元，而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还必须是贵族出身呢。中国状元不是靠推荐，世袭，而是靠考出来的。平等竞争，这在那时，多民主，多先进呀！”（参阅柯岩《“天才曾经是中国”》，《光明日报》1991.3.23）

此乃百分之百的肯定。对立的见解无妨引这样一例——

毛泽东是最激烈的反对科举制的人之一。他在1964年甚至很绝对地说，历来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参阅毕剑横《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第10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这里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总不好说完全没有合理的内核。

这种对立的评价也并不始于今日，用套语可谓“古已有之”，这里我们不赘引。只想说，把这两项评价“合二为一”，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当然，要在这篇短文中

对中国科举制及其产儿状元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是戛戛乎难的。我们不妨这样来议论一番。

中国的科举，对于统治者来说，至少有两个功用，一方面它确实擢识了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其中也不乏从进步意义上说的真人才），这是当日隋炀帝始开科举就明确表示过的目的，这就使上层阶级逐渐失去的活力和社会稳定所急需的内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一方面或许更主要的方面是有着笼络士子，收拾人心，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特殊作用，它驱使士流纷纷拥挤到这条狭窄的羊肠小路上去博取功名，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中，实在是维护统治的一条良策。

而科举对于士人来说，又有着“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的诱惑力与吸引力，一方面科举对门阀观念是一种冲击，高贵的血缘地缘不再是通行于仕途的唯一凭证，这就使一部分士子有着一一种理想性的渴望与追求，是士人晋身的最主要的途径，如林语堂在其名著《吾士吾民》中所言，“它基本是一条由寒门通向权势与名利的向人人都开放的途径”，可以通过它改变自己的处境与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道名僵利锁的禁锢，而且科举制下极易培养出读死书的呆子。美国学者史密斯曾写道：“从前一个老童生，一直考到90岁，不考中不止，不考死也不止……试问90岁以后，即使考中了秀才，又怎么样？”（参见《中国民族性（一）》第37页，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版）这反问着实有力。除了瞠目结舌之外竟无以言对，只道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可悲在这里也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这里对科举已经作了统而言之的初步探讨，再结合着说说状元。

据统计，从北宋的第一位状元王嗣宗到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末代状元刘春霖，930年间，我国的状元共有342人。加上隋唐数百年科举状元之数则比此数要多。这些状元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折现，多少可以说中试授官以后便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也多少打下了一点印记，其中进步一点的或者说是真正意义的人才的拔尖的状元也常怀报国热肠，力图革故鼎新，在授官以后或许可以为官一任，有利一方，可以为民做一些事情，给政坛注进几许清风，这本书里所写的状元大多可归入这一类型。历史应该记住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历史的某一页上。但多数的状元，在人类文化的创造中，似乎并不是真正的第一名，反倒可以说除了是庸才外充其量只是科举的陪衬物与牺牲品，后来人不知道他们不消说，历史也没有记住他们。历史反而记住了许多并不是状元的人，如李白。不妨这样说，许多真正的人才在状元之外，如林语堂说科举“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李白不屑于去求科举的功名，倘使他去做了状元郎，中国可能多了一个平庸的状元，而少了一个天才的诗人。

这里便带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来。造成状元里面真正的第一流人才少，或者说得更广泛一点造成科举制下真正的人才少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试说几点，未悉准确与否——

1. 由于科举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如前说很容易培养出读死书的人；又如考试只需饱读经书便造成考生其它知识的空白，造成士人对医农工商知识的轻视，科举制遂成为中国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人才匮乏的直接原因；八股文成为应试文体之后也造成种种流弊，日本学者渡边秀方说：“八股文是使中国的官吏愈加变成形式的文体。”台湾学者项退吉说，八股文“这种文体从明朝到清朝300多年的漫漫长期，

支配了所有年青有为的知识分子”。（以上均参《中国民族性（一）》第143页、228页）

2. 又由于状元的产生除了凭才学，又得靠运气之外，其中也还与政治上的明争暗斗、朝廷的黑幕丑闻、主考的人情私心以及考试的舞弊等联系在一起，这便免不了冒牌货或者“水货”。

3. 状元郎中试后有许多人往往只知对朝廷感恩戴德，只知唯朝廷马首是瞻，而很少有个性的发展，当初考试只需死读经书，就决定状元的知识结构的欠缺，授官以后走上仕途，更少能参与门类广泛的文化创造，成为文化人才。而且往深里说，中试之后并不意味着即可俯拾青紫，有真才实学也不一定都能有用武之地，封建制度限制了他们才能的施展，不少正直有才之士登第之后连遭挫折，结局悲惨。

4. 科举制下士人青灯孤檠、皓首穷经、趋之若鹜的仅仅是为了博取功名，于国运民生竟很隔膜，如此的胸襟未免太狭窄了，这样的追求也似乎太短视，以此等胸襟和追求之人是断断成不了大气候的。如《儒林外史》所写范进中举后疯癫虽为极例，却也可以看出一些弊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扭曲人格和悲惨命运一半在这里。有识见的知识分子对此是抱切肤之感的。左宗棠就说过：“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

总而言之，我们这里并不想对中国科举制作一全面深入的评说，而是为了说清状元问题而对之略作剖视，归结为一句话：中国的科举制及其产儿状元的出现与行废，都是一个存在，都有其程度不同的合理性。这或许正是我们对待科举制及其产儿状元的基本态度。也不管怎么说，我们或许可以从本书的状元故事的叙述，一了解中国科举考试的情况和士

人心态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着的历史事件，二学一点古人暑寒青灯锲而不舍的读书精神，学习一点知识，多一点知识无论如何是比少一点知识要好的，对于我们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总有好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民间俗语用状元一词称呼某一方面出色之人，也可以说是一种“推陈出新”，我们也期待本书的读者成为各行各业的新状元，如果读者竟以为这也是我们推出此书暗含的一种寓意，我们并不打算否认。

• 审稿人语 •

王羲之

王羲之

